

李調元詩話評注

吳熙貴 評注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王心富
封面设计 罗晓蓉
技术设计 郑汉生

吴熙贵评注
李调元诗话评注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长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34千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7-5366-0771-7/I·147

定价: 2.10元

序

霍 松 林

我们的伟大祖国，向来被人们赞誉为诗的国度。早在先秦时代，《诗经》和《楚辞》就为我国的诗歌发展奠定了优良传统。随着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诗歌创作百花竞艳，诗歌理论批评也异彩纷呈，蔚为壮观。钟嵘的《诗品》，《文心雕龙》中的《辨骚》、《明诗》和《乐府》，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都是著名的诗学论著。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以诗话形式论诗的著作，又不断涌现，至清代而形成高潮。据统计，清人诗话多达三四百种，这是一宗丰富的诗学遗产，值得深入发掘；然而截至目前为止，除少数几种有校注本而外，绝大多数还没整理。从这一意义上说，吴熙贵先生的《李调元诗话评注》的出版，无疑填补了一个空白，是值得欢迎的。

李调元字赞庵，号雨村，清代四川绵州罗江（今属绵阳市）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历任吏部主事、考功司员外

郎、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等官。因得罪权臣和珅被充军伊犁，后以母老乞养赎归，家居二十多年，勤于著述。有《童山诗集》、《诗话》、《曲话》、《剧话》及大型丛书《函海》行世。《诗话》分上、下两卷，以时代先后为序，纵论汉魏六朝唐宋元明各个历史时期的诗歌，颇有系统性。其论诗宗旨，在于强调“诗以道性情”，反对矫揉造作、涂饰模拟。这就为诗歌创作指出了一条宽阔的正路。正因为这样，他对不少诗人、诗作的评论比较准确。如评李、杜云：

人各有所长，李白长于乐府歌行而五七律甚少，杜甫长于五七律而乐府歌行亦多，是以人舍李而学杜。盖诗道性情，二公各就其怡情而出，非有偏也。使太白多作五七律，于杜亦何多让。

从“各就其性情而出”解释李白律诗为什么少于杜甫的问题，是颇有见地的。

对于六朝诗，尽管他也认为其总的特点是“绮丽”，却不像有些人那样因其“绮丽”而一笔抹倒。他说：

诗之绮丽，盛于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如宋则以鲍照（明远）为第一，其乐府如五丁开山，得未曾有，谢瞻辈所不及也。齐

则以谢朓（玄晖）为第一，名句络绎，俱清俊秀逸，武帝、简文帝所不及也。梁则以江淹（文通）为第一，悲壮激昂，何逊犹足比肩，任昉辈瞠乎后矣。陈则以阴铿为第一，琢句之工，开杜子美一派，徐陵、江总不及也。至北周则唯庾信（子山）一人而已，不但诗凌轹百代，即赋启四六，上下千古，实集大成，宜为词坛之鼻祖也。

大家都知道：“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这是陈子昂的观点；“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齐梁以来，艳薄斯极”，这是李白的看法。自此以后，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六朝诗，乃是诗歌评论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李调元不随人脚跟，能够对六朝诗歌作出那样具有真知灼见的精辟论断，是难能可贵的。

李调元对某些诗作的理解和鉴赏，也独出手眼，别具匠心。例如汉乐府中的《陇西行》，全篇描写、并赞美了一个能操持门户的“好妇”，似乎别无深意。李调元却作了如下的阐释：

凡诗有有题者，有无题者。有题是诗之正面，无题是诗之反面。如乐府《陇西行》，何篇中无“陇西”之意？为尊者讳也。立是名，补诗之不足

也。“陇西”二字是题正面，全诗却是反射旁击。汉武有事于西南，穷兵黩武，陇西男子无不荷戈从戎，巨室细民莫敢匿。故篇中备言妇人待客，委曲尽礼，以见家中无男子也。言豪富者尚无男子，贫穷者岂容燕息乎？夫劳苦疆场，必餐风宿露，今反写欢乐，其劳苦却在言外，使后人于无字处默会也。写陇西以反衬天下，写豪富反衬贫苦，写妇人反衬男子，写闺门反衬边廷，可悟作文之法。若唐以后人作《陇西行》，必备写山川风景，有何妙意？

这样的诠释是否符合作者的本意，当然难于判断。然而紧扣历史背景，从题与诗、正与反、实与虚等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展开思维，驰骋想象，妙悟迭出，精义纷披，可谓精于鉴赏，在古代诗论家中还是罕见的。对于《枯鱼过河泣》、《饮马长城窟行》等篇的解释，也能长人才智，发人神思。

李调元还善于讲诗法。如所谓“活字法”、“联章法”、“借叶衬花之法”、“意在空际之法”等等，都能结合实例，谈得鞭辟入里。

当然，李调元论诗，也并非完美无缺。例如他说：“诗以人品为第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却以此为由否定“荆公文章”，就大错而特错。对于“江西诗派”、

特别是“后山诗”的贬抑，也失于偏激。此外还有一些因误记而导致的知识性错误，虽无伤大雅，也是应该指出的。

吴熙贵先生多年来从事古代文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参加了《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评注》、《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评注》与《精选历代诗话评释》的编写，积累了一些资料。他交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李调元诗话评注》一书，有注有评，评注结合。注的部分，对名词术语作了必要的解释，对一些作家写了小传。评的部分，又分总评与分评。总评对李调元的文艺观作了全面评述；分评则在注释之后，对李调元评论某些诗、某些诗人的不妥之处加以评论，对李调元误引的人名、诗句、词语等等，也一一纠正。这一切，都对读者很有帮助，因而也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88年元旦写于见山楼

诗话原序

古人诗话类多摘句，以备采取。唐宋而降，指不胜屈矣，余非敢然也。但自念生平于诗有酷嗜，而以日以月，总觉前此之非。古人云：医三折肱为良医。不知于此道，究何如也？积学未忘，尝以为诗法不出乎诸大家，每于同人多谆谆论辩。今摘句可以为法者，略举一二以课儿，与俗殊酸咸，在不计也。因所论皆诗，故亦曰诗话云。罗江李调元鹤洲识。

凡 例

一、“丛书集成”中把李调元诗话名为《诗话》，并在《诗话》前刊有《诗话序》；《清诗话续编》则标为《雨村诗话》未刊序言。今更名为《李调元诗话》并升原序于前。

二、本书原文以“丛书集成”本《诗话》为底本，并参考新排《清诗话续编》本《雨村诗话》校点。

三、凡《诗话》原文中人名、引诗、引文之误，一律在注释中校正说明。

四、《诗话》从三代至明代，按诗歌发展历史顺序，论述各个历史时期诗、乐的特点，并对各个历史时期优秀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评述。为使读者易解，注文务求浅易明白，并对各个历史时代作家撰写了小传。于所引诗句，尽量引录全诗或引录相邻的诗，以便研讨。

五、《李调元诗话评注》，兼用注释与意译。注释力求详实、准确；意译力求符合原意，语言力求精炼。书中对

李调元评论作家、作品类之全面或不确切之处，都作了评论。

六、本书附录李调元部分诗话、曲话、赋话、诗集与文集的序言，这对了解李调元文艺观是有裨益的。

七、附录李调元年谱，以助于了解李调元生平。

目 录

序.....	霍松林 1
诗话原序.....	7
凡例.....	1

李调元文艺观评述.....	1
李调元诗话评注(上).....	25
李调元诗话评注(下).....	99

附 录

李雨村先生年谱.....	203
雨村诗话序.....	211
全五代诗序.....	212
童山文集序.....	214
蜀雅序.....	215
雨村曲话序.....	217
赋话序.....	219
雨村词话序.....	220
童山诗集序.....	222
寄雨村老前辈诗启.....	224

后 记.....	225
----------	-----

李调元文艺观评述

在李调元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涉及了许多方面，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文艺理论问题。在这里，我仅就李调元诗话与附录的几篇序文所涉及的文艺理论问题作初步探讨，请教于专家与读者。

在评介李调元文艺观之前，我先对清代诗话所涉及的几种文学批评观略作介绍，这对了解清诗话概况，对了解李调元文艺观都是有益的。

要说宋代诗话是我国诗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那么清代诗话可以说是我国诗论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清代诗话无论是数量之多，还是其系统性与完整性，都是宋代诗话无可媲美的。在近人丁福保编辑的《清诗话》和郭绍虞的《清诗话续编》两套书中，就编辑了七十七部诗话专著。从这两套书中，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各个历史时代的作家及其作品，而且还可以了解我国诗论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深入研究清代诗话理论，对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有裨益的。

清代诗话著作林立，论诗流派如灿烂群星，学术空气异常活跃，在文艺领域内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以“四说”：“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与“肌理说”最有代表性。在这“四说”中，各以自己的主张为好，形成相互矛盾、相互争鸣的局面。正如周振甫先生说的，在清朝的“诗话里往往发挥作者对于文学批评的见解，这些见解有的是相互矛盾的，有的是后者要纠正前者论点的偏颇的，但后者的论点也不免偏到另一方面去。这些象清朝的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有可取处也各有不足处……”

（《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第6页）。其评论不仅精湛，而且也为研究清代诗话特别是“四说”，开辟了一条可行的蹊径。

王士禛首创“神韵说”。他对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含而不露的评诗论点推崇备至；并根据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所讲的：“神韵气力”而提出“神韵说”。它的基本要求是，诗意含蓄，风格清远，语言淡雅。从诗的特点论诗及其创作，可谓知诗矣。诗是以艺术形象抒情言志与描写景物的，而不是以赤裸裸的形式表达情意的。诗贵含蓄，诗贵形象，诗要有意境，这是我国诗论评诗歌的最基本的要求。王士禛的“神韵说”是针对明人学唐人诗，只学其腔调与格式，而无真情实感而发的。他认为诗

的意境要美，诗人的感情要真，诗意要含蓄，不宜疏露，等等。这比明人只学习唐人作诗形式要高妙得多，正确得多。当然，“神韵说”也存在着不足即对诗歌题材不重视，忽视了诗歌的思想性。

要说王士禛的“神韵说”是从诗意含蓄、风格清远、语言淡雅等方面，提出作诗、评诗的主张，那么，沈德潜则是从诗的格式与音节方面提出“格调说”。翁方纲认为“格调说”主要是指“诗歌的基本格式与音节”（《石洲诗话》）。这说明“格调说”主要是研究诗歌的形式。“格调说”是针对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诗必盛唐”的主张提出来的。沈氏认为只把“盛唐”的诗当成效法典范，只认为“盛唐”诗格为最高的看法是不全面、不正确的。他认为学习前人应抱“转益多师”的态度，兼学众贤之长，反对只推崇一个时代或一种风格流派的作法。他通观历代诗作，探索各种风格流变，然后评其优劣。这种治学的方法，是很好的，因为这种治学方法是比较全面而又客观的评价不同时代作家及其作品的。不过，如果从风格特点探讨“格调说”，就可以发现沈德潜的言行也是不统一的。他主要着眼于杜甫所向往的一种“未掣鲸鱼碧海中”与韩愈在《调张籍》中赞扬李白、杜甫的“巨刃磨天扬”一类具有雄健豪壮的阳刚之美的风格。沈德潜在《说诗晬语》（卷上）中对与“格调说”相关的诗法、诗艺亦作了精辟地论述。如说：“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可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

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如磻沙僧解《三体唐诗》之类）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他所讲的“神明变化”，即是讲作诗要用“活法”，把诗写活，写得有生气，写得真实可信，写得有真情实感。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从他评诗总的倾向看，则同王士禛一样，只注重诗的艺术技巧，忽视了诗的思想内容。

至于袁枚的“性灵说”，一方面是与“神韵说”、“格调说”相抵牾；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而提出来的。

“性灵说”主要是强调诗歌创作要抒发诗人的感情，从诗的内容出发论诗，这是符合古代诗论的抒情言志要求的。先秦诸子论诗，主张诗言志，到了汉代学者把诗言志与缘情结合起，并突出了诗写景抒情特点。这是诗论的一次革新创举。从汉魏以至唐代，抒情言志成为评论作家及其作品的主要论点。自韩愈开创“以文为诗”后，到了宋代发展为“以议论为诗”，从而把诗的抒情特点忽视了。袁枚针对宋人“以议论为诗”的仿古、拟古的庸俗风气，提出“性灵说”，要求诗歌创作表现人的真情实感，要求诗人把诗写活、写新、写真以及写得自然，等等。这可以说是诗论上的一次革新，是诗论的突破。他的创新精神，是与他的敢于突破权威与不受前人的束缚分不开的。他在《随园诗话》中写道：“徐凝咏《瀑布》云：‘万古常疑白练飞，一条界破’

青山色。’的是佳语，而东坡以为恶诗，嫌其未超脱也。然东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似比徐诗更恶矣。人震苏公之名，不敢掉臂，此应邵所谓‘随声者多，审音者少’也。”这种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袁枚所倡导的写真、创新，反对仿古、拟古的主张与看法，对诗歌创作及其评论，都有指导意义。但是，由于他过分强调创新和奇特，会产生轻佻之病。他所倡导的“性灵说”，主要的是强调抒发个人的感情，而没有把个人感情同时代要求结合起来。这样也会忽视作品思想内容。

翁方纲的“肌理说”是同袁枚“性灵说”针锋相对的。他从风格的细密出发，认为宋人说理的作品是无可非议的，是应充分肯定的。如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这虽然主要是评宋文的，但并不排斥对诗歌的评论。翁氏与袁枚相反，他对苏轼与黄庭坚推崇备至。他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石洲诗话》）。不仅如此，他同意江西诗派仿古、拟古的观点，认为诗歌创作应把古典、古事作为反映的内容，并认为学诗多从读书与学习古人中去吸取营养，而不是深入生活、面向现实。因而他对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一些感时愤世之作，都不感兴趣。这同宋人推崇王维寄情山水之诗，而不喜欢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是一致的。

从以上对“四说”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各以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为好，并以各自的文艺观去评论历代诗人及其作品。彼此之间，不仅各自的论点相互矛盾，就各自的论点讲，也都存在着偏颇之弊。在“四说”的争鸣中，不仅活跃了学术空气，而且从他们各自主张看，有些论点对文学创作及其批评，还是有益的。从某种意义讲，清代诗话理论可堪称我国论诗理论的黄金时代。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开拓与研究，尚待深入一步。开拓发掘清代诗话理论，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具有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都是有益的。

“四说”各自的主张虽有不同，但其共同特点是大致相同的：都是重视诗的艺术形式，对诗的社会功用、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都不太重视；因而必然出现忽视诗歌思想性的倾向。如果从论诗的社会功用、论诗歌与时代关系、把评诗品人同时代结合起来等方面看，李调元的诗论主张要比“四说”高明得多；如从论述的方法讲，“四说”也不及李调元。王士禛与袁枚等人对不同时代、不同诗派以及作家作品的评价都存在着偏颇的看法。如袁枚对宋代诗以及苏轼与黄庭坚等人几乎是否定的；而翁方纲却对宋代文学与苏轼、黄庭坚又完全予以肯定，各持一端，有失全面。李调元对六朝文学的评价既有否定的也有肯定的。他虽言“雅不好宋诗”，但并未全盘否定宋诗。由此可见，在论述宋诗上，李调元也比“四说”高出一筹。